

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变迁及其影响因素

——五省(市)60 村的跟踪研究(1999—2011)

肖唐镖¹ 余泓波²

(1. 南京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23; 2. 西南政法大学 中国社会稳定与危机管理研究中心, 重庆 40004)

摘要 基于江西等五省(市)1999—2011 年五次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数据分析, 发现十余年来农民政治价值观呈现现代化或世俗化的总体趋势。其中, 多数政治价值观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 如民主观、法治观、政党观均以过渡型为主导, 权利观已走向现代主导型, 只有政府观仍以传统型为主导。就变迁方向而言, 民主观、权利观与政府观呈正向变迁, 均由传统向现代转变; 相反, 法治观却是逆向变迁。在政治社会化各因素中, 年龄的代际变化、教育程度的提升、经济状况的改善、政治参与实践和传统文化禀赋是影响农民政治价值观变迁的主要因素。有关政治文化解释的现代化理论在此得到检验, 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特殊论”。

关键词 政治价值观; 民主观; 法治观; 权利观; 政府观; 政党观

作为政治文化核心而稳定的内在要素, 政治价值观为社会与政治发展提供了十分重要的支撑。本文将政治文化理论为工具, 以 1999 年至 2011 年间的五次调查数据为基础, 对当代我国农民的政治价值观进行较为系统的实证考察。研究发现, 农民的政治价值观虽总体呈现现代化或世俗化的变迁趋势, 但其民主观、法治观、权利观、政府观与政党观却表现出方向不尽一致的变动。对此, 我们将借助政治社会化理论, 做出进一步的理论解释。

一、中国民众的政治价值观: 文献讨论

中国民众政治观念的变化及其影响, 是近年来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在 2010 年北京举行的“中国政治发展: 中美学者的视角”课题组研讨会议上, 拉里·戴蒙德教授预测: “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 在下一个世代, 中国公民的政治期望和价值观将会发生剧烈变化。世界价值观调查和其他类似研究展示了人们在更加富足的现代社会, 对权威的态度和政治价值观以及对个人在政治体系中正当权利和角色的认知会发生何等翻天覆地的改变, 这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 后工业化时代将人们从传统与世俗权威中解放出来, 造就了

一种解放伦理。”^①

有关中国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多已支持上述判断, 表明其政治文化或政治价值观正在现代化、理性化。史天健早前的研究显示: 与其他民主制相对协调的社会相比, 中国大陆政治态度与价值的分布是相似的。但就其比例而言, 中国只有 20% 到 30% 民众的政治态度与价值符合民主要求。^②随后, 钟扬从选举支持以及有关精英政治、政治参与、言论自由和政治宽容的态度等维度, 测量了中国农民的民主价值观, 也反驳了农民是民主的阻碍的传统认知。^③他对 10 个大城市居民政治关注度的调查分析, 也证明中国城市居民对一些基本价值的追求同世界各地的情况一致, 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特殊论”。^④Steve Chan 借助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 测量四个国家与地区样本的政治态度与价值, 研究表明对中国政治文化与西方差异的传统描述已不适用。如就儿童教育而言, 与美国和加拿大相比, 中国人更强调独立、努力工作、想象力等现代甚至后现代的价值, 而良好礼貌、宗教信仰、服从等却在和美国和加拿大得到更多地强调, 台湾地区政治文化在某些方面与大陆类似, 在另一方面与美国、加拿大相似。作者认为“这些事实挑战了许多关于中国态度与

收稿日期 2013-09-1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对策研究”(08AZZ005)

价值的传统性质”。也就是说，中国政治文化及其承袭的传统特质，并不一定会阻碍民主政治的建立与发展。^⑤李连江的研究也发现：农民既有规则意识，也有权利意识。^⑥

不过，在境外学界，仍有学者坚持认为中国民众政治文化与价值观“特殊论”。如裴宜理教授强调中美民众权利观的差异性，认为与美国民众惯常于诉诸公民权不同，中国民众却往往为生存权而抗争，其抗争与其说源于权利意识，不如说是源于规则意识。^⑦在国内学界，与主流舆论一样，也有学者持“中国特殊论”。如季丽新提出，农民政治文化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胶着、家族文化在政治文化格局中扮演重要角色。^⑧但多数研究者认为，中国农民的政治文化或价值观正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中，以“民主理念”为核心的政治文化在曲折中前进。^⑨

总之，转型时代中国农民的政治价值观之“变”似已成为多数研究者的共识。不过，迄今为止，学界的相关研究仍往往着眼于宏观，长于对“变迁”的粗线条描述，但未能揭示政治文化或政治价值观变迁的细节与具体走向。更重要的是，已有的经验性研究往往基于某一时点的数据而展开，难以对“变迁”这一纵贯性问题进行有力的解释。关于中国民众尤其是农民政治文化和政治价值观变迁的实证解释，研究者们往往验证或检验的是现代化理论，如强调经济增长^⑩、城市化、教育^⑪、政治效能感和政治满意度^⑫、传统价值与宗教信仰^⑬、人口流动^⑭、政治参与如村选举^⑮、大众媒介^⑯等因素的影响。鉴此，本文将采用十余年间的跟踪调查数据，力求从经验角度对当代中国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变迁进行描述和解释。

二、研究设计

(一) 资料来源

表 1 五次调查数据样本统计

调查时间	调查地点	有效问卷(份)
1999 年	江西 40 村、江苏 20 村	1200
2002 年	江西 40 村、山西 16 村	547
2005 年	江西 40 村、山西 9 村、重庆 20 村、上海 9 村	1671
2008 年	江西 40 村、重庆 20 村、上海 11 村	1280
2011 年	江西 40 村	822

文本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对江西、江苏、山西、重庆和上海五省（市）在 1999 年至 2011 年进行连续跟踪调查而建立的五次调查数据库。在这些立意选择的样本县，我们按分层比例抽样方式抽取乡镇和村，然后在每个村各抽取 10 个或 20 个村民进行结构性访问，最后完成的村民样本情况见表 1。

(二) 概念操作化

政治价值作为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相较于政治认知与政治情感具有更强的稳定性，这已成为学界的基本共识。如阿尔蒙德将政治文化操作化为认知、情感、评价三个部分，其中，政治评价尤其指“那些涉及价值的判断和准则”^⑰。不过，对于政治价值观的内涵及其构成，学者们却有不同争论。有人认为，政治价值观是“指人们对政治生活、政治系统及其运行状态的一种价值期待和评估，是关于政治生活某种应然状态的设定，是关于政治系统运作目标及其责任履行机制的一种理想化诉求。”^⑱有人主张政治价值观即“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由于阶级、经济、文化的因素决定或影响而形成的对政治社会的基本观点和态度，包括对正义、法治、公民效率、民主等的态度、看法和观念。”^⑲也有学者把政治价值观看做“如何看待人民与政府的关系，特别是应当如何遴选政府官员，以及应当如何约束政府的观念。”^⑳还有学者认为，政治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对政治世界的看法，包括对社会成员的看待，评价某种政治系统及其政治活动的标准，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主体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的选择标准”^㉑，或是“人们对所处社会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的基本看法和观点，包括对政治理想、政治现实的基本评价及价值倾向。”^㉒还有学者将政治价值简化为价值观（自由、平等）与制度观（民主、法治）两部分。^㉓Merle Goldma 则提出，现代核心的政治价值主要包括政治宽容、自由、权利意识、选举意识。^㉔

我们认为，政治价值观反映的是公民有关政治运行及其发展的主观价值期待或主张。在广义上，它包括对于人类社会政治价值的一般观念，以及特定政治共同体的价值判断与取向。在狭义上，政治价值观则主要针对特定政治共同体的政治价值判断取向。本文主要依广义角度，从民主观、法治观、权利观、政府观、政党观五个维度，对我国农民的政治价值观进行测量（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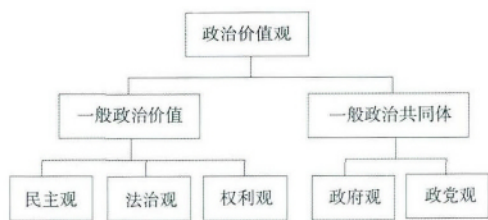


图1 政治价值观的操作化

在一般政治价值层次上，我们选取了民主观、法治观以及权利观。至于自由、平等等重要价值，我们将其纳入民主观与权利观中进行考察，如在民主观中考察言论自由观念，在权利观中考察平等观念。在特定政治共同体层次上，我们选取了政府观与政党观。政府观指的是抽象的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亦指国家，而不涉及诸如中央政府、省级政府等具体的政府机构。而政党观则着重考察民众对于政党等政治组织及其体系的认知与评价。

（三）研究假设

关于政治文化的影响因素，阿尔蒙德主要从心理层面^②和社会层面^③进行解释，后者强调政治社会化、组织成员角色^④的作用。白鲁恂则关注个人社会化进程与公共机构运行的关系对政治文化变迁的影响。^⑤帕特南从新制度主义的视角，追溯了历史传统对于公共精神的影响，他认为制度历史与社会模式中诸多因素的承袭同样深刻影响着政治文化及其变迁。^⑥还有研究者从受访者的内在的个性差异入手，检验了诸如“聪慧”“开朗”“认真”“热情”“稳定”等个人性格特质对包括政治信息、政治态度与价值、政治参与在内的政治行为的影响，认为性格特征对政治行为确实存在着多种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不过个性特征的影响要通过一定的中介因素进行。^⑦如前所述，对于当代中国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变化，多数研究者实际上也主要是从上述视角进行解释，尤其强调经济社会转型与“全球化”等结构性因素的作用。本研究将这些结构性因素视为农民政治价值观变迁的背景，而非直接的解释变量，拟从农民的个体差异、个人社会化、社会经济地位、政治参与经历、传统文化等角度进行解释。假设如下：

假设1：农民的个体差异，如男性相对于女性、年轻者相对于年长者，其政治价值观更加趋向于现代化和世俗化。

假设2：农民的政治价值观受其教育程度、

政治面貌、工作经历等社会化因素的影响。教育程度高者相对于教育程度底者、党员相对于非党员、工作的流动性高者相对于流动性低者、乡村精英相对于非精英，其政治价值观更加趋向于现代化和世俗化。

假设3：农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较高者相对于较低者，其政治价值观更加趋于现代化。

假设4：公共参与和正式政治参与对农民政治价值观的现代化具有正向的推动作用，而非正式政治参与则起到逆向的阻碍作用。

假设5：农民的政治价值观受以集体主义、家庭主义、男权主义为特征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它们对农民的政治价值观现代化具有逆向的障碍作用。

三、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变迁

（一）政治价值观的变迁

1. 民主观的变迁

表2 农民民主观的变迁

	单位：%				
	1999年	2002年	2005年	2008年	2011年
目前我国进一步扩大民主（竞选）会影响稳定	17.6	/	/	/	11.3
不要随便议论政治问题，以免被人抓小辫子	31.1	/	/	/	21.4
一种意见能否在社会上传，应由政府决定	/	56.3	41.0	42.7	/
只要有了品德高尚的领导人，任何事情都可以由他做主	/	56.7	54.1	51.1	56.3
乡（镇）长应该直选	48.4	49.9	51.2	50.2	42.8
县（市）长应该直选	26.5	31.5	32.4	39.7	32.4

注：“/”表示当年的问卷没有涉及此题，下同。

对民主观测量的维度，主要有：（1）对我国现阶段扩大民主（或竞选）的态度。其问项，1999年为“我们国家如果搞竞选，就会大乱，您同意吗”，2011年为“目前我国进一步扩大民主会影响稳定，您同意吗”；（2）对言论自由的态度。问项有二：“不要随便议论政治问题，以免被人抓小辫子，您同意吗？”“一种意见能否在社会

上流传，应由政府决定，您同意吗？”；（3）对开明专制的态度。问项为：“只要有了品德高尚的领导人，任何事情都可以由他做主，您同意吗？”；（4）选举期待，主要考察对县、乡两级直接选举的期待。问项为：“您认为下面这些职务，现在是否可以让群众直接选举产生：乡（镇）长、县长？”

对以上问项表示认同的农民所占比例，详见表 2。从表 2 可见，赞同扩大民主（竞选）与言论自由的农民比例有明显上升，但赞同“开明专制”取向与主张县（市）、乡（镇）行政首长直选的农民比例，并无明显变化。

2. 法治观的变迁

对于农民的法治观，主要考查：（1）群众意见与法院审判的关心。问项，1999 年为“对民愤极大的罪犯，应立即处罚，不必等待法院来审判，因为它太复杂了。您同意吗？”2011 年为“您是否同意，法院审判重大案件时应该根据多数群众的意见审判？”（2）农民的维权取向。问项为：“当政府侵害个人的合法权益时，我们应该去法院起诉政府，您同意吗？”“当政府侵害个人的合法权益时，我们应该去冲击政府机关，您同意吗？”对这些说法表示认同的农民所占的比例见表 3。

表 3 农民法治观的变迁

	单位：%				
	1999 年	2002 年	2005 年	2008 年	2011 年
法院审判重大案件时应该根据多数群众的意见审判	32.9	/	/	/	44.8
当政府侵害个人的合法权益时，我们应该去法院起诉政府	/	48.8	33.4	47.5	29.8
当政府侵害个人的合法权益时，我们应该去冲击政府机关	/	4.3	1.9	2.6	4.9

从表 3 可以看出，农民的法治观并未出现提升趋势。就司法独立于民意而言，农民的法治观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认同“群众审判”人治取向的农民比例增加超过 10%。当个人合法权益受到政府侵害时，愿意采取“民告官”途径的农民比例维持在三至五成之间，不够稳定。而赞同采用暴力方式的农民比例虽然也有波动，但始终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一直在 5% 以下。值得注

意的是，虽然选择法律途径解决的农民比例在每个时点上都远远大于选择暴力性途径的农民比例，但对于法律途径的偏好并没有逐年增强的趋势。

3. 权利观的变迁

对农民的权利观，我们主要考察平等意识、参与和监督意识。测量的问项有：①“妇女不应该享有和男人一样参与政治的权利，您同意吗？”②“党和政府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老百姓不必过多参与，您同意吗？”③“无论如何，老百姓都不应该批评政府，您同意吗？”

对这些说法表示认同的农民所占比例见表 4。

表 4 农民权利观的变迁

	单位：%				
	1999 年	2002 年	2005 年	2008 年	2011 年
妇女不应该享有和男人一样参与政治的权利	22.3	25.1	21.9	20.3	17.8
党和政府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老百姓不必过多参与	56.0	/	/	/	51.7
无论如何，老百姓都不应该批评政府	/	25.9	21.0	21.1	22.7

注：（1）题 1：1999 年与 2002 年问卷中测量权利观中性别平等的题目表述为“男的比女的对政治应该有较大的发言权，您同意吗？”；（2）题 2：1999 年问卷中测量参与权的题目表述为“党和政府能够管好国家，您同意吗？”

由表 4 可以看出，农民的权利观呈现强化趋势。其中，性别之间政治权利平等的意识越来越强，持男权主义倾向的农民大致在两成左右，十余年间有小幅减少；农民对于政治参与的权利意识有所增强，对批评权的诉求也有所增强。

4. 政府观的变迁

表 5 农民政府观的变迁

	单位：%			
	2002 年	2005 年	2008 年	2011 年
社会风气不好，政府应负主要责任	79.7	68.3	59.8	61.7
个人的能力有限，群众应该主要依靠政府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困难	63.8	57.1	58.9	58.6

在政府观方面，主要考察农民对于政府责任以及个人与政府关系的态度。测量的问项有：①“社会风气不好，政府应负主要责任，您同意吗？”②“个人的能力有限，群众应该主要依靠政府来

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您同意吗？”认同这些说法的农民所占比例见表 5。

表 5 的结果表明，农民对政府责任认知中的全能主义取向日益降低，认为政府要对社会风气负主要责任的农民比例下降近两成，认同个人对政府的依赖倾向的农民也有小幅下降。换言之，农民的国家主义与全能政府观成分在日益减少，但认同这些取向的农民比例始终居高，超过半数，维持在六成左右。

5. 政党观的现状

在五次调查中，仅 2011 年考察了政党观，设计的问题有：①“有人说，一个地方、国家如果政党太多，就不利于社会稳定，您同意吗？”②“有人说，我们国家如果搞两党或多党制，就会大乱，您同意吗？”它们主要从社会稳定的政党功能角度检测受访者的政党政治意识。结果见表 6。

表 6 农民的政党观（2011 年）

	单位：%				
	完全 不同意	不大 同意	基本 同意	比较 同意	完全 同意
一个地方、国家如果 政党太多，就不利于 社会稳定	4.6	17.3	47.1	23.3	7.7
我们国家如果搞两 党或多党制，就会 大乱	11.0	20.8	48.4	15.9	3.9

结果显示，多数农民依然认同长期来的主流舆论，即：两党或多党制不利于社会政治稳定，因而倾向于认同现行的政党制度。当然，其中也有值得重视的细微差异，即抽象的政党观与具体的政党观的分化：在第一题有关非特定地域（或国家）的抽象考察中仅有两成左右农民倾向于两党或多党制，而在第二题关于特定地域（或国家）的考察中这一比例上升到三成。

（二）政治价值观的类型与分布

如果把政治价值观分为传统型、过渡型与现代型的话，那么，农民的政治价值观是如何分布和变迁的，有何特征？

所谓传统型政治价值观主要具备封闭性、依附性、单一性、集体主义取向以及感性的特征；所谓现代型政治价值观主要具备开放性、独立性、多元性、个体权利取向以及理性特征。而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过程中的政治价值观，便是过渡型政治价值观。就具体的操作化而言，我们将民

主观、法治观、权利观、政府观与政党观的相关测量题目的各个选项赋值。在选择具体测量题目时，我们遵循两个原则：一是所选题目要得到数据支持，由于本研究的数据时间跨度大、调查次数多，同一题目可能未能在各年份均有涉及；二是所选题目要尽可能涵盖这一价值观内部不同变迁模式的维度。如按此两原则，在分析民主观类型时，我们选择言论自由维度和选举期待维度作为依据。其他价值观的操作与此类此，详见表 8 中的说明。

赋值方法为：在 0 至 10 的赋值区间内，代表政治价值观越现代的选项赋值越高，反之则赋值越低，其中，选项为四项的赋值为“0”“3.3”“6.7”“10”，选项为五项的赋值为“0”“2.5”“5”“7.5”“10”。之后，将五种价值观各自的测量题目的得分分别相加，再求平均值，得到每个样本在民主观、法治观、权利观、政府观与政党观的得分指数。本文回归模型中各政治价值观的因变量操作方法亦与此相同。就政治价值观的类型的划分而言，我们把得分在 0~3.4 分之间的定义为传统型政治价值观，在 3.5~6.5 分之间的定义为过渡型政治价值观，6.6~10 分之间的定义为现代型政治价值观。

表 7 显示了各种政治价值观在不同年份间的类型分布及其变化。

为了对我国农民政治价值观的类型分布及其变迁状况进行更直观的分析，我们在原有的传统型、过渡型、现代型的静态分类基础上增加了动态的分类标准，即按照类型分布与类型变迁对本文研究的五种政治价值观进行了分类。就类型分布而言，按传统型、过渡型、现代型三种政治价值观所占的比例进行划分，如那种类型的价值观所占比例较高，我们便以此政治价值观为主导。为了表述方便，我们按其变迁方式将其特征分别概括为正向变迁与逆向变迁，详见表 8。当然，动态的变迁模式中，也可能出现传统型与现代型均减少，而过渡型增加的模式即聚中变迁，但本研究并未出现此类型。

从表 8 可见，正处于转型社会中的我国农民，其政治价值观表现出明显的转型特色。首先，就当下的主导类型而言，多数政治价值观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阶段，如民主观、法治观、政党观均以过渡型为主导，只有政府观仍以传统型为主导，欣喜的是权利观较快地走向现代主导型。其次，就变迁方向而言，存在着正向与逆向两种

模式。其中，民主观、权利观与政府观呈现正向变迁，均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相反，法治观却是逆向变迁。

表 7 农民政治价值观的类型分布

		单位：%		
政治价值观	年份	传统型	过渡型	现代型
民主观	2002 年	34.5	50.1	15.4
	2005 年	25.2	56.5	18.3
	2008 年	20.3	53.2	26.5
	2011 年	17.4	54.0	28.6
法治观	2002 年	1.3	64.7	34.0
	2005 年	0.8	63.4	35.8
	2008 年	1.4	63.7	34.9
	2011 年	6.4	63.6	29.9
权利观	2002 年	13.0	37.3	49.7
	2005 年	5.6	41.1	53.3
	2008 年	8.1	44.8	47.1
	2011 年	5.2	43.4	51.3
政府观	2002 年	76.0	19.4	4.6
	2005 年	64.5	28.5	7.1
	2008 年	60.3	31.7	8.2
	2011 年	60.0	30.4	9.6
政党观	2011 年	16.7	67.2	16.2

注：此处的测量题目分别为：（1）民主观：①一种意见能否在社会上流传，应由政府决定，您同意吗？/不要随便议论政治问题，以免被人抓小辫子，您同意吗？②您认为下面这些职务现在是否可以让群众直接选举产生：乡镇长、县长？（2）法治观：①当政府侵害个人的合法权益时，我们应该去法院起诉政府，您同意吗？②当政府侵害个人的合法权益时，我们应该去冲击政府机关，您同意吗？（3）权利观：①妇女不应该享有和男人一样参与政治的权利，您同意吗？②无论如何，老百姓都不应该批评政府，您同意吗？（4）政府观：①社会风气不好，政府应负主要责任，您同意吗？②个人的能力有限，群众应该主要依靠政府来解决他们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您同意吗？（5）政党观：①一个地方、国家如果政党太多，就不利于社会稳定，您同意吗？②我们国家如果搞两党或多党制，就会大乱，您同意吗？

表 8 农民政治价值观变迁的类型分析

		传统型主导 (传统型>过渡型>现代型)	过渡型主导 (过渡型>现代型>传统型)	现代型主导 (现代型>过渡型>传统型)
正向 变迁	传统型→ 现代型	政府观	民主观	权利观
逆向 变迁	现代型→ 传统型		法治观	
/			政党观	

四、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因素

（一）变量的操作化

本文将使用多元回归方法检验前述研究假设，分析影响农民价值观的主要因素。回归模型中的因变量，采用上述政治价值观指数的操作方法，由表 2 至表 6 中的部分问项而得到。相关自变量的操作化处理如下：

个体差异变量：①性别。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②年龄。若问卷中为受访者出生年份，则用调查年份减去出生年份作为年龄；若问卷中为受访者年龄，则直接使用。

政治社会化变量：①教育程度。1999 年的调查中，教育程度用上学的年数测量，其他年份按照小学没毕业及以下、小学、初中、高中（中专）、非全日制大学（夜大、职大、函大、自考）、全日制大学及以上依次赋值为“0”“2”“4”“6”“8”“10”。②政治面貌。本文主要通过政治面貌来考查作为社会化组织的政党的政治社会化对于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因而只做党员与非党员的区分。党员赋值为“1”，非党员赋值为“0”。③工作经历。我们用一道多项选择测量了工作经历。在操作化中，我们将工作经历划分为三个类别，即本地工作经历（务农种田、管家务、在本地乡镇企业打工），乡村精英经历（村干部、教师、医生、集体企业负责人、私营企业主），外地工作经历（在外打工、做生意、跑运输、搞建筑、参军）。我们进一步对这三类包含多项选择的变量进行处理，做了如下界定：本地工作经历指仅做过本地工作种类中的一种或几种工作，而并未做过乡村精英工作与外地工作；乡村精英工作经历指做过乡村精英工作种类中的一种或几种工作，并可能有本地工作经历，但无外地工作经历；外地工作经历指做过外地工作种类中一种或几种工作，并可能有本地工作经历或乡村精英工作经历。由此，我们将原有的多选题转换成了三个互斥的定类变量，并将拥有某一类工作经历赋值为“1”，无某一类工作经历赋值为“0”。表 9 表明了五次调查中农民三种工作经历的百分比变化。由于我们着重考察的是农民工作的流动性与乡村精英经历对其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并且本地工作经历与外地工作经历存在着高度的负相关关系，会引起回归模型的共线性问题，因而未将本地工作经历变量进入模型。

表 9 农民工作经历类型的变迁

单位: %

	1999 年	2002 年	2005 年	2008 年	2011 年
本地工作经历	49.7	54.1	38.2	29.1	32.4
乡村精英经历	9.5	12.6	14.9	7.5	10.6
外地工作经历	40.8	33.3	46.9	63.4	57.0

社会经济地位: ①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我们用“您家在本地的社会地位属于哪一等?”和“和其它家庭相比, 您家的经济状况属于哪一等?”两题对受访者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进行了测量, 选项有“下等”“中下等”“中等”“中上等”“上等”“不知道”“不回答”, 我们将“不知道”“不回答”处理为缺失值, 将其与五个选项依次赋值为“0”“2.5”“5”“7.5”“10”。受访者两题选择得分的均值即为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数。②客观经济状况。我们用1999年、2002年的受访者的年总收入来测量其客观经济状况。而在2005年至2011年, 本文则选择通过受访农民的住房条件及其所拥有的日常消费品来测量其经济状况。我们将其租房状况分为: 土坯房、砖瓦平房、砖瓦楼房、钢混房, 分别赋值为3、5、10、40, 问卷中涉及的日常消费品有: 彩色电视机、电冰箱、计算机/电脑、洗衣机、固定电话、汽车、自来水、国际互联网、摩托车、手机, 分别赋值为3、4、10、6、2、30、3、4、3、2。我们将每位受访者的住房及所拥有的消费品按以上对应赋值相加并加以处理, 得到其客观经济状况的分层变量。③客观社会地位。结合受访对象及农村地区的特点, 我们用受访者的血缘、地缘状况来测量其社会地位。具体问题为: “您家在村里属于大姓还是小姓?” “您家在村里属于大族还是小族?” “您家所在的自然村, 在行政村里是大还是小?” 对于前两题, 我们将选项“大姓/大族”的赋值为2, “小姓/小族”赋值为0; 对于后一题, 我们将选项

“大自然村”赋值为2, “不大不小”赋值为1, “小自然村”赋值为0; 此三题选择“不知道”均处理为缺失值。之后, 将受访者的这三题选项赋值相加, 得到最低为0、最高为6的社会地位变量。

公共参与变量: ①家族活动参与。我们考察了家族活动参与对于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影响。具体而言, 我们设计的问题为“如果您家族举办活动要求大家参加, 您会参加吗?”选项为“无论如何都不参加”“想办法推了, 尽量不参加”“如果自己有事, 就请假不参加”“如果大家参加, 我也会参加”“会积极参加”, 依次赋值为“0”“2.5”“5”“7.5”“10”。②正式政治参与。我们考察了受访者是否有过“通过组织向上级反映意见”“通过各级人大代表反映意见”“请村干部出面解决”“直接向干部反映意见”四种正式参与行为, 受访者选择“偶尔做过”、“有时做过”或“经常做过”均视为“做过”, 赋值为“1”, 没做过则为“0”, 再将每位受访者对四种参与行为的选择的得分相加, 得到正式政治参与变量。③非正式政治参与。我们考察了受访者是否做过“参加集体上访”“通过不交摊派、税来表示不满”“向领导抗议, 或围攻、冲击他们”“团结大伙一起顶”四种非正式的参与行为, 其变量操作方法与正式参与相同。^⑧

传统文化变量: 我们用包含七道题的量表对农民的传统文化心理进行了测量, 其结果见表10。其中, 每道题均有“完全不同意”“不太同意”“基本同意”“比较同意”“非常同意”“说不清”六个选项, 我们依次将“说不清”定义为缺失值, 其余五项依次赋值“0”“2.5”“5”“7.5”“10”, 并用因子分析的办法将其合成为传统文化因子。表9为历次调查中, 选择“完全同意”与“比较同意”的农民所占的百分比, 不难看出, 农民对于传统文化的心理认同水平逐渐降低。

表 10 农民传统文化心理的变迁

单位: %

	2002 年	2005 年	2008 年	2011 年
一般来说, 个人利益应该服从集体利益	92.0	84.7	90.8	74.4
父母的要求即使不合理, 子女也应该照着去做	30.5	30.4	30.7	26.5
一个人努力向上最主要是为了光宗耀祖	49.9	46.5	43.3	42.5
婆媳闹矛盾时, 即使婆婆不对, 丈夫也应该劝妻子听婆婆的话	55.0	45.6	48.6	39.5
一个人即使有能力学识, 也不要表现出来	37.3	34.3	34.1	26.6
一个人的富贵贫贱、成功失败, 都是命中注定的	36.0	31.9	28.8	26.4
如果只准生一个孩子, 生儿子总比生女儿好	47.4	29.1	25.0	34.5

(二) 农民价值观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1. 民主观的影响因素

表 11 为农民民主观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具体来说, 个体差异变量中, 性别在各年份

均不具有显著性。年龄的假设则在三个年份中均得到了验证, 即年轻者相对于年长者而言, 其民主观更加现代化。

表 11 农民民主观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年份 自变量	1999 年	2002 年	2005 年	2008 年	2011 年
常数项	4.186 (13.946)	4.292 (6.484)	5.083 (13.724)	4.370(15.323)	5.355 (10.269)
性别	0.011 (0.333)	-0.035 (-0.743)	0.014 (0.459)	-0.015(-0.399)	0.064 (1.551)
年龄	-0.033 (-0.944)	-0.127* * (-2.428)	-0.099* * * (-2.967)	0.016(0.462)	-0.079* (-1.688)
教育程度	0.156* * * * (4.282)	0.055 (1.113)	0.132* * * * (3.827)	0.090* * (1.989)	-0.021 (-0.464)
党员身份	-0.014 (-0.479)	0.032 (0.672)	0.020 (0.591)	0.034(0.862)	0.040 (0.915)
乡村精英经历	0.057* (1.836)	-0.006 (-0.137)	-0.080* * (-2.315)	0.010(0.255)	-0.006 (-0.137)
外地工作经历	0.052 (1.559)	0.033 (0.726)	-0.015 (-0.447)	-0.003(-0.071)	-0.013 (-0.283)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	0.061 (1.386)	0.029 (0.968)	-0.030(-0.775)	0.101* * * (2.475)
客观经济状况	0.070* * * (2.400)	-0.090* (-1.824)	-0.096* * * (-3.170)	0.003(0.066)	-0.026 (-0.641)
客观社会地位	/	0.049 (0.988)	-0.010 (-0.375)	-0.012 (-0.328)	-0.023 (-0.612)
家族活动参与	/	-0.034 (-0.765)	0.011 (0.377)	-0.018 (-0.522)	/
正式政治参与	0.011 (0.356)	0.206* * (1.894)	0.100* * * * (3.422)	-0.042 (-0.729)	-0.014 (-0.333)
非正式政治参与	0.009 (0.299)	-0.155 (-1.426)	0.003 (0.120)	0.107* (1.795)	0.097* * * (2.458)
传统文化	/	-0.357* * * * (-7.778)	-0.206* * * * (-6.785)	-0.296* * * * (-7.944)	-0.155* * * * (-3.997)
Model Test	R ² =0.054 F=7.474	R ² =0.211 F=8.378	R ² =0.117 F=12.131	R ² =0.127 F=7.963	R ² =0.058 F=3.555
Valid N	1200	499	1119	724	707

注: 表中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 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 * * * $p \leq 0.001$, * * * $p \leq 0.01$, * * $p \leq 0.05$, * $p \leq 0.1$, “/” 表示该年份无该自变量数据。

表 12 农民法治观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年份 自变量	1999 年	2002 年	2005 年	2008 年	2011 年
常数项	5.711 (11.052)	0.916 (1.922)	5.372 (24.462)	5.509 (30.192)	4.858 (13.855)
性别	0.037 (1.073)	0.090* (1.666)	-0.011 (-0.342)	0.064* (1.669)	0.128*** (2.834)
年龄	-0.065* (-1.810)	-0.110* (-1.838)	-0.005 (-0.136)	0.016 (0.432)	-0.054 (-1.043)
教育程度	0.000 (0.013)	-0.047 (-0.844)	0.038 (1.037)	0.036 (0.758)	0.097** (1.946)
党员身份	0.072** (2.353)	0.007 (0.128)	-0.006 (-0.173)	0.016 (0.401)	0.063 (1.290)
乡村精英经历	0.010 (0.328)	-0.046 (-0.811)	-0.014 (-0.376)	-0.021 (-0.506)	0.076 (1.522)
外地工作经历	0.013 (0.377)	-0.010 (-0.178)	0.049 (1.359)	0.079** (1.854)	0.115** (2.238)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	-0.070 (-1.340)	0.024 (0.728)	-0.003 (-0.069)	-0.024 (-0.545)
客观经济状况	0.093*** (3.138)	-0.017 (-0.328)	0.038(1.153)	-0.105** (-2.323)	-0.005 (-0.107)
客观社会地位	/	-0.012 (-0.235)	0.016 (0.550)	0.003 (0.068)	0.003 (0.068)
家族活动参与	/	0.003 (0.058)	0.047* (1.552)	0.055 (1.491)	/
正式政治参与	-0.032 (-1.032)	-0.157 (-1.395)	0.109*** (3.492)	0.079 (1.319)	0.046 (0.999)
非正式政治参与	-0.003 (-0.098)	0.113 (1.001)	0.052* (1.716)	0.056 (0.891)	-0.020 (-0.474)
传统文化	/	-0.037 (-0.707)	-0.148*** (-4.550)	-0.064* (-1.632)	-0.112*** (-2.589)
Model Test	R ² =0.021 F=2.835	R ² =0.033 F=1.033	R ² =0.055 F=4.987	R ² =0.043 F=2.476	R ² =0.103 F=5.287
Valid N	1187	412	1118	724	564

注：表中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p \leq 0.001$ ，** $p \leq 0.01$ ，* $p \leq 0.05$ ， $p \leq 0.1$ ，“/”表示该年份无该自变量数据。

政治社会化变量中，教育程度在三个年份均表现出了对民主观现代化的正向推动。党员身份在各年份均为通过显著性检验。乡村精英的工作经历对于民主观的影响由 1999 年的正向变化为 2005 年的负向，其余年份不具备统计显著性。

社会经济地位类变量的影响并不显著，客观经济状况在 1999 年表现为正向影响，而在 2002 年、2005 年表现出负向影响。

政治参与类变量中，诸如家族活动的公共参与在各年份均不具备统计显著性，正式政治参与在 1999 年与 2002 年表现出对民主观现代化的正向影响，非正式政治参与则在 2008 年和 2011 年的正向影响。

传统文化变量在 2002 年至 2011 年四次调查数据中均通过了 0.00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且都呈现着对于农民民主观的负面影响，其影响程度

在 2005 年有所提高，随后又逐渐降低。由此我们 明显的阻碍作用。
可以说，传统文化对于农民民主观的现代化具有

表 13 农民权利观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年份 自变量	1999 年	2002 年	2005 年	2008 年	2011 年
常数项	4.500 (13.449)	5.794 (8.598)	6.047 (12.665)	6.278 (24.818)	5.362 (15.137)
性别	0.063** (1.925)	-0.004 (-0.092)	0.011 (0.366)	-0.024 (-0.630)	-0.029 (-0.823)
年龄	-0.034 (-0.976)	0.087 (1.714)	-0.147*** (-4.374)	0.004 (0.104)	-0.082** (-2.060)
教育程度	0.221**** (6.189)	0.140*** (2.861)	0.150**** (4.319)	0.104** (2.239)	0.199**** (5.052)
党员身份	0.034 (1.174)	0.022 (0.469)	0.058* (1.723)	-0.047 (-1.169)	0.022 (0.601)
乡村精英经历	0.012 (0.408)	-0.009 (-0.187)	-0.086*** (-2.471)	-0.059 (-1.422)	0.006 (0.163)
外地工作经历	0.042 (1.290)	0.133*** (2.742)	-0.052 (-1.554)	-0.026 (-0.631)	0.032 (0.837)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	0.021 (0.461)	-0.015 (-0.481)	-0.041 (-1.019)	0.057* (1.650)
客观经济状况	0.070*** (2.452)	-0.058 (-1.310)	-0.077*** (-2.537)	0.081* (1.838)	-0.036 (-1.044)
客观社会地位	/	-0.034 (-0.804)	-0.017 (-0.606)	-0.044 (-1.190)	-0.035 (-1.105)
家族活动参与	/	-0.044 (-1.020)	0.015 (0.512)	-0.021 (-0.579)	/
正式政治参与	-0.058** (-1.969)	0.141 (1.163)	0.016 (0.543)	0.028 (0.487)	0.041 (1.140)
非正式政治参与	0.009 (0.324)	-0.199* (-1.649)	-0.036 (-1.273)	-0.014 (-0.223)	0.073** (2.193)
传统文化	/	-0.280*** (-6.267)	-0.359*** (-11.75)	-0.220*** (-5.777)	-0.342*** (-10.373)
Model Test	R2=0.092 F=13.391	R2=0.142 F=6.185	R2=0.246 F=25.188	R2=0.084 F=5.023	R2=0.249 F=21.148
Valid N	1187	499	1118	724	777

注：表中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 t 检验值，****p≤0.001，***p≤0.01，**p≤0.05，*p≤0.1，“/”表示该年份无该自变量数据。

2. 法治观的影响因素
表 12 为农民法治观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从中可以看出，个体差异变量假设基本得到了验证。性别在三个年份通过显著性检验，表现为男性的法治观比女性更为现代。年龄在 1999 年

与 2002 年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表现为年轻者的法治观念强于年长者。
政治社会化变量中，教育程度与党员身份仅仅分别在 2011 年和 1999 年表现出对农民法治的正向推动作用。就工作经历而言，外地工作经历

在 2008 年与 2011 年表现为对农民法治观的正向影响，而乡村精英经历则在各年份均不具备统计显著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法治观的影响并不显著，其中仅有客观经济状况在两个年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其影响方向有 1999 年的正向转变为 2008 年的负向。

政治参与类别中的三个变量，仅在 2005 年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公共参与、正式政治参与、非正式政治参与对农民法治观的现代化均表现为正向的推动作用。

传统文化对于农民法治观的影响在 2005 年至 2011 年均具有统计显著性，表现为对于法治观的阻碍作用，即传统观念越强，法治观念越弱。

表 14 农民政府观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自变量 \ 年份	2002 年	2005 年	2008 年	2011 年
常数项	4.675 (6.609)	3.895 (12.660)	4.042 (21.289)	4.078 (8.717)
性别	0.016 (0.288)	0.013 (0.440)	-0.006 (-0.167)	0.044 (1.120)
年龄	-0.228*** (-3.841)	0.007 (0.204)	0.063 (1.725)	-0.081* (-1.832)
教育程度	-0.196*** (-3.337)	0.054 (1.525)	-0.004 (-0.088)	-0.013 (-0.303)
党员身份	0.038 (0.686)	0.072** (2.097)	-0.039 (-0.960)	0.002 (0.054)
乡村精英经历	-0.051 (-0.891)	0.000 (0.002)	0.009 (0.216)	-0.047 (-1.111)
外地工作经历	-0.081 (-1.404)	0.019 (0.543)	0.022 (0.535)	0.011 (0.251)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051 (0.970)	-0.041 (-1.328)	-0.015 (-0.375)	0.074** (1.915)
客观经济状况	0.142*** (2.740)	-0.100*** (-3.213)	0.026 (0.588)	-0.056 (-1.438)
客观社会地位	0.062 (1.402)	0.003 (0.100)	0.017 (0.448)	-0.016 (-0.456)
家族活动参与	-0.071 (-1.387)	0.031 (1.051)	-0.009 (-0.237)	/
正式政治参与	-0.259** (-2.099)	-0.072*** (-2.394)	-0.075* (-1.281)	-0.080** (-1.993)
非正式政治参与	0.335*** (2.721)	-0.039 (-1.361)	0.015 (0.241)	-0.013 (-0.353)
传统文化	-0.162*** (-3.021)	-0.342*** (-10.974)	-0.249*** (-6.463)	-0.172*** (-4.653)
Model Test	R2=0.117 F=3.948	R2=0.122 F=10.374	R2=0.067 F=3.929	R2=0.057 F=3.845
Valid N	499	986	724	777

注：表中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p≤0.001，** p≤0.01，* p≤0.05，p≤0.1，“/”表示该年份无该自变量数据。

3. 权利观的影响因素

表 13 为农民权利观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个体差异变量中，性别仅在 1999 年均有统计显著性，表现为男性权利观比女性更现代。年龄在 2005 年与 2011 年呈现出对于农民权利观的负向影响。

政治社会化变量中，教育程度在五次调查数据中均表现出对于权利观的正向影响，表明学校教育对于农民权利观念强烈而稳定的推动作用。而其他的政治社会化变量中，党员身份、外地工作经历与村务管理参与在个别年份具有统计显著性，其余均为通过显著性检测。

社会经济地位变量在对于农民权利观的影响上，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 2011 年表现出正向影响。客观经济状况则在 1999 年与 2008 年表现出正向的影响，而在 2005 年表现出负向的影响。

传统文化则在 2002 年至 2011 年的四次调查中均通过了 0.001 的显著性检验，表现出对农民权利观的现代化的阻碍作用。

4. 政府观的影响因素

从表 14 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的政府观主要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具体来说，个体差异变量中，

年龄在两个年份对农民的政府观具有负向影响，年轻者比年长者更具备现代的政府观。而性别对于农民政府观的影响却并不显著。

政治社会化变量中，教育程度仅在 2002 年表现出对农民政府观的现代化的逆向影响作用。党员身份仅在个别年份表现出对农民政府观的现代化的正向影响。其余的政治社会化变量均没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社会经济地位对于农民政府观的影响并不明显，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在 2011 年起到了正向作用，而客观经济状况的影响方向则由 2002 年的正向变为 2005 年的负向。

政治参与类变量中，公共参与与非正式参与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正式政治参与则表现出与假设截然相反的影响，即在 2002 至 2011 年四个年份的检验中表现出对农民政府观的逆向影响。由于这里所讨论的政府观中包含对政府全能主义的考察，而越是采取正式政治参与行为向政府寻求帮助，则越会加剧这种政府全能主义的认知倾向。

传统文化变量则在 2002 年至 2011 年的四波调查中均对农民政府观的现代化起到了阻碍作用。

表 15 农民政党观影响因素回归分析

自变量		自变量	
性别	0.027(0.648)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0.093 * * (2.270)
年龄	-0.079 * (-1.688)	客观经济状况	-0.015(-0.354)
教育程度	0.000(-0.007)	客观社会地位	-0.046(-1.221)
党员身份	0.071 * (1.628)	正式政治参与	0.036(0.845)
乡村精英经历	-0.063(-1.416)	非正式政治参与	-0.007(-0.169)
外地工作经历	-0.095 * * (-2.093)	传统文化	-0.084 * * * * (-2.168)
Model Test	R ² =0.037 F=2.251 Valid N=717	常数项	5.726(14.373)

注：表中系数为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内为 t 检验值，* * * * p≤0.001，* * * p≤0.01，* * p≤0.05，* p≤0.1。

5. 政党观的影响因素

表 15 为 2011 年调查中，农民政党观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从我们可以看到，年龄、党员身份、外地工作经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传统文化对于农民的政党观的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影响。具体来说，年龄、外地工作经历与传统文化对农民政党观具有负向影响，而党员身份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则是正向的。其余变量则均不具备统计显著性。

外地工作经历对政党观的影响方向与假设不同。由于农民的外地工作流动绝大多数是由信息

相对闭塞的地区流向信息相对发达的地区，这一过程中，农民可能更多地接触到了主流舆论对“两党、多党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宣传，因而受到了与假设不同的社会化影响。

五、结语

本文的研究显示，农民政治价值观在过去十余年间确实是在发生变迁，亦如其他学者所说，正处在混乱与胶着的过渡期，但我们也有一些新的发现。首先，就民主观而言，仍以过渡型而非现代型为主导，但正向现代化方向变迁。有学者曾

言,国人“大部分人在讲到民主的时候,实际上是孔孟的民本思想”,其关于民主的定义“和西方的程序民主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⑧,但本文研究发现,农民已不再局限于传统民本思想,而正向现代民众观转型。其次,就法治观而言,不少研究者认为农民正在人治与法治观之间徘徊,但趋势上已进一步的现代化。^⑨不过本文发现,农民的法治观仍以过渡型为主导,并呈回退趋势。其三,农民已基本具备现代权利观,正朝现代方向转变。其四,农民的政府观仍以传统型为主,但正朝现代型方向发展。其五,政党观正处于过渡型为主导的状态。总之,转型期中国大陆农民的基本政治价值观呈现着过渡性与一定程度混乱的特点。

进一步的多元回归分析表明,传统文化、正式与非正式的参与实践、经济状况、年龄和教育程度等因素,对上述政治价值观的变迁有着强烈而持续性的显著影响,相关研究假设得到验证。性别、党员身份、乡村精英身份、外地工作经历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等因素仅在个别时段对个别价值观发生了影响,而来自客观社会地位与家族参与实践的影响却并不显著。换言之,在政治社会化各项因素中,对当代中国农民政治价值观的变迁而言,年龄的代际变化、教育程度的提升、经济状况的改善、政治参与实践与传统文化禀赋是主要的影响因素,有关政治文化解释的现代化理论主张在此得到检验,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特殊论”。这也正向人们预示了一个较为乐观的前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推进,中国农民各项基本政治价值观的变迁将更为现代化和世俗化。对中国内地的民主化与法治化建设而言,这无疑是值得期待而赞赏的必要基础。

注释

①拉里·戴蒙德:《评王长江〈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中国治理评论》(第1辑),俞可平主编,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年,第71页。

②⑪史天健:“Cultural Values and Democra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62, Special Issue: Elections and Democracy in Greater China(Jun., 2000), 540-559.

③⑫钟扬:“Democratic Values Among Chinese Peasantry: An Empirical Stud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3, no. 2 (2005), 189-211.

④钟扬:“Mass Political Interest in Urban China: An Empirical Study”,“比较政治学与世界民主化、城市化”学术会议,上海,2012年10月。

⑤Chan, Steve. “Chines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Values

in Comparative Context: Cautionary Remarks on Cultural Attribution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no. 3 (2008): 225-248.

⑥李连江:“Rights Consciousness and Rules Consciousness in Contemporary China.” *China Journal* no. 64 (2010): 47-68.

⑦裴宜理:《中国式的“权利”观念与社会稳定》,《领导者》2008年第23期。

⑧季丽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政治文化的特征与创新》,《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3期。

⑨戴玉琴:《基于村民自治视野下的农村政治文化转型特征论析——以江苏为分析案例》,《求是》2008年第10期;张娟:《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文化的变迁》,《兰州学刊》2006年第9期;彭庆军:《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三维透视》,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课题组:《市场经济条件下村落社会的政治文化变迁——安徽十五县(市)村落政治文化建设的研究报告》,《学术界》2006年第1期。

⑩黎安友、史天健:“Cultural Requisites for Democracy in China: Findings from a Survey.” *Daedalus* vol. 122, no. 2,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Spring, 1993), 95-123.

⑬钟扬:“Between God and Caesar: the Relig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Values of Chinese Christians.”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60, no. 3(May-June 2013): 36-48.

⑭徐增阳:《“民工潮”的政治社会学分析》,《长白学刊》2009年第1期。

⑮丁开杰:《村民自治与政治文化的“正向”发展——以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的民主实践为例》,《长白学刊》2009年第1期;张娟:《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政治文化的变迁》,《兰州学刊》2006年第9期;彭庆军:《当代中国农村政治文化变迁的三维透视》,武汉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课题组:《市场经济条件下村落社会的政治文化变迁——安徽十五县(市)村落政治文化建设的研究报告》,《学术界》2006年第1期。

⑯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87页。

⑰⑱⑲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国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徐湘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14页,第235页,第289页。

⑳袁潇、风笑天:《改革开放30年我国青年流行文化与价值观的变迁》,《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㉑楼益松等:《研究生政治价值观现象的剖析》,《中国高等教育》2001年第9期。

㉒潘维:《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理论参考》2007年第3期。

㉓夏增明:《“和谐”思想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㉔孔繁斌:《农民政治价值观变迁与权威分化:政治控制取向》,《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7期。

㉕佟德志:《政治文化的层次结构与要素分析》,《晋阳

学刊》2012年第3期。

②④ Goldman, Merle.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1.

②⑤ 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87页。

②⑧ Pye, Lucian W. and Sidney Verba. *Political Culture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9, 5.

②⑨ 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51页。

③⑩ Mondar, Jeffery J. *Personalit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Political Behavio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③⑪ 1999年政治参与变量内容略有不同:正式参与行为

包括“当面给村干部提意见”“当面给乡镇干部提意见”“要求村党支部书记给乡镇提意见”“要求村委会主任给乡镇提意见”,非正式参与行为包括“参加集体上访”“组织集体上访”“联合邻村的村民一起上访”;操作方法与其他年份相同。

③⑫ 潘维等主编:《聚焦当代中国价值观》,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17-218页。

③⑬ 赵波文:《当代中国社会政治价值观调查报告》,《甘肃理论学刊》2009年第11期;熊光清:《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与政治发展》,《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12期;伍颐园:《中国政治文化现代化变迁的基本格局及制约因素》,《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1期。

责任编辑 王敬尧

On the Change of Chinese Peasants' Political Values and Its Determinants: Based on the Tracking Study of Five Provinces (1999-2011)

Xiao Tangbiao¹ Yu Hongbo²

(1. School of Govern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2. Research Center of Chinese Social Stability and Crisis Management,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 Law, 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 Based on five waves of survey conducted in five provinces (cities) from 1999 to 2011, this paper finds out that peasants' political values become roughly more modern and secular in China. Although most of the political values are in the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they show different changing direction. In addition, findings from this paper show that, among the elements of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ge, education, economic statu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attitudes ar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influenc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peasants' political values.

Key words : political values; modernization of culture;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political culture; Chinese peasants